

雪山下有一顶帐篷



目 录

我和辞典(代序)	(1)
----------------	-------

一 历史长河的小浪花

1. “东方第一谋杀案”的真相	(5)
2. 老古井的怀念	(18)
3. 周恩来与“古田会议”	(22)
4. 我和“白牡丹” ——夏大姐讲的故事	(27)
5. 三个大姐在风雪中	(40)
6. 心中的莲花池	(48)
7. 基督徒·红军医生	(51)
8. 她, 交党费的非党员 ——革命母亲夏娘娘的故事	(63)
9. 毛主席借钱	(71)
10. 草地婚礼	(76)
11. 偷密电码的姑娘	(84)

12. 罗瑞卿扮演蒋介石…………… (98)
13. 周恩来长汀办后勤…………… (102)
14. 战役前夕见陈总
——一位老同志的回忆…………… (108)
15. 一片松叶的来历…………… (115)
16. 给马寅初先生缺席祝寿…………… (123)

二 生活之树的绿叶

1. 传奇夫人…………… (131)
2. 特提斯海之歌…………… (143)
3. 我爱沙海…………… (148)
4. 华山问答…………… (155)
5. 捕鲢记…………… (160)
6. 巧绣人间春色…………… (163)
7. 两朵白玫瑰…………… (168)
8. 炒面条的悲喜剧…………… (174)
9. 海棠赋…………… (178)
10. 亮晶晶的星哟…………… (186)
11. 黄鹤重飞回…………… (196)
12. 眼睛的故事…………… (202)
13. 夜间值班灶
——雪山书简…………… (207)

14. 花海子纪事·····	(215)
15. 战野牛·····	(222)
16. 绿的奇迹·····	(229)
17. 我见过你·····	(234)
18. 雪山下有一顶帐篷·····	(239)
19. 歪打正着话“洁银”·····	(248)
20. 牡丹缘·····	(253)
21. 幽香的君子兰·····	(259)
22. 北极光·····	(262)
23. 元宵畅想曲·····	(266)
24. 春雪润心花·····	(274)
25. 传电话的老头和她·····	(279)
后记·····	(284)

我和辞典

(代序)

一个人有一个爱好。

我喜欢字典、辞典。在我的书架上，摆着从《新华字典》、《四角号码辞典》到《辞海》、《辞源》，还有《社会科学辞典》、《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写作成语词典》以及我和孩子们共用的《英汉小辞典》、《英汉辞典》、《汉英辞典》等等。也有类似辞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诗人玉屑》一类的工具书。

我在辞典帮助下增长知识，也在辞典帮助下提高了写作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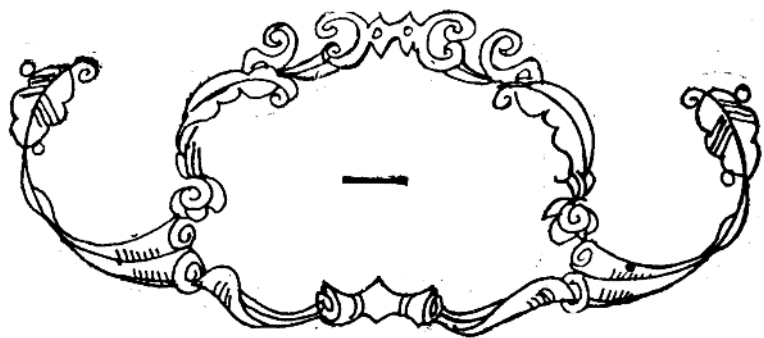
这爱好起初是在没有书读的情况下养成的。一九四八年我十四岁时入伍。少年人的精力是旺盛的。连续的夜行军，紧张的抢救伤员，都无法遏止我的读书欲。啊，有一本书看该多好啊！尤其想看小说，想读诗歌。打锦州时，在硝烟还未散尽的路上拾了几本《观察》，一直背到河南，才被炊事班长抢去卷烟抽掉。在天津郊区，找到一本巴金的《家》，后来被没收了。能够长期陪伴我的，是在冷口进关住在建昌营子时，买的一本小字典。它是我的挚友，我的老师。行军休息时，我翻开读几个字。住下来，便一有时间就翻。恨不得变条书虫子，把那字都吃到肚子里去。后来，在天津和平路买了

一本《四角号码辞典》。一九五六年，又在劝业场旧书摊上买了一部《辞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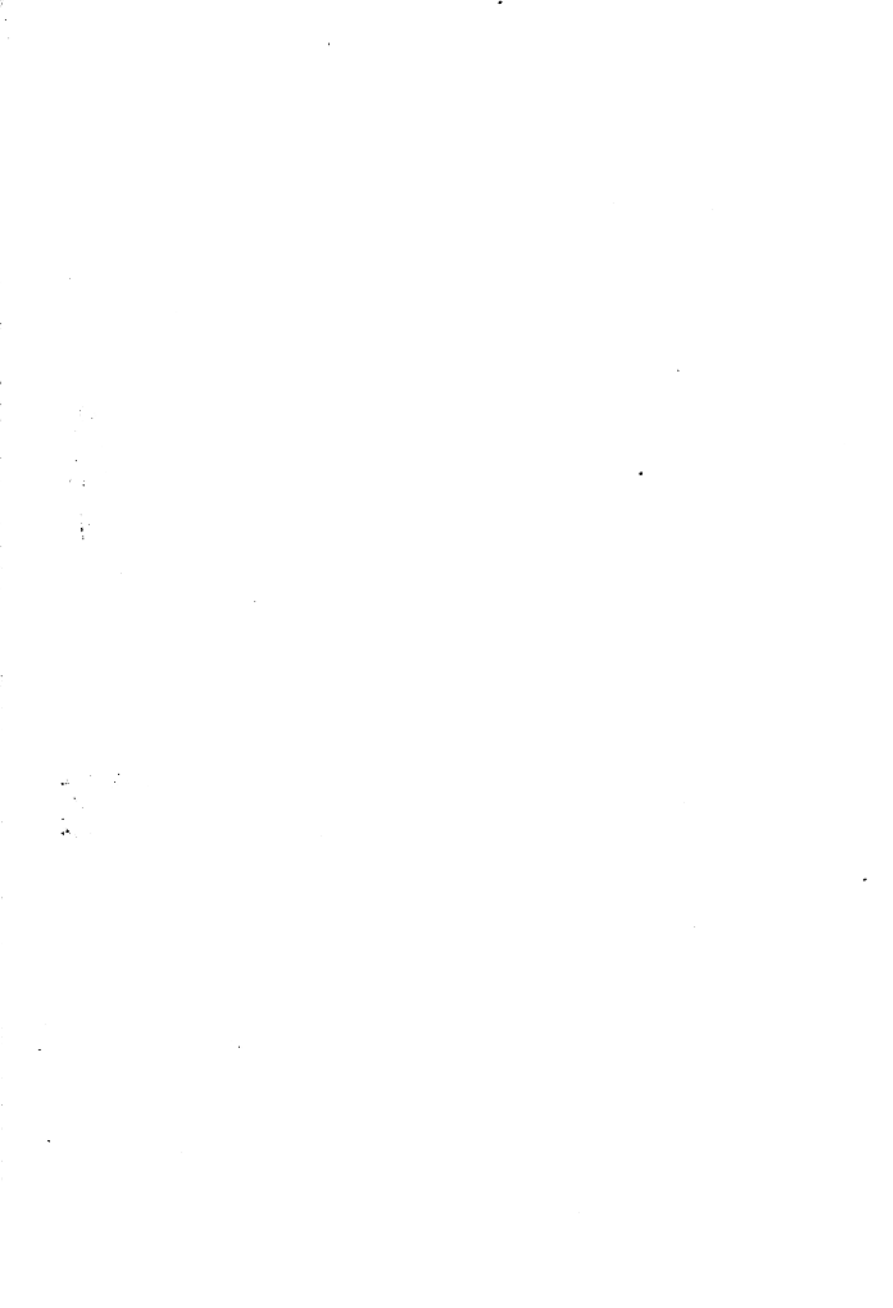
辞典帮助我提高了语文水平，我开始写作了。现在，我已经先后出版了《傅连璋传略》、《永存的微笑》、《罗瑞卿大将》、《紫薇之光》等数本书，发表了数百篇散文、小说和诗歌，而且，《傅连璋传略》、《罗瑞卿大将》先后荣获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我是满族），但我仍然离不开辞典。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习惯，闲下来就想翻翻辞典，不断地增进我的知识。

喜爱辞典，我原以为是我这原来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的特殊需要，近来阅读冰心同志的《冰心论创作》，发现她也有这个爱好：“我到现在还爱看《辞海》一类的书，没事就拿来消遣。”我敬佩的一位革命老大姐严昭同志，“十年浩劫”时因受牵连，住了八年多单身牢房。她为了保持记忆，熟悉语言，以便出狱后能继续为人民工作，在最后两年里允许给她带东西时，她首先要的就是一部《辞海》。她在狱中读它，念它，甚至唱它。终于保持住了工作能力，出狱不久便走上编辑岗位，编辑出版了许多好书。

辞典是知识之海，它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因之，我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历史长河的小浪花



“东方第一谋杀案”的真相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上海。

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四弄小巷狭小，路灯昏暗，四周寂静无声。

十一时左右，四弄四十三号后门悄悄启开，钻出一个人来。他立在那里，四处观望，认为没什么危险，便回头向里面招招手。于是，几个人鱼贯而出。他们护着一个穿黑色西装、戴眼镜的家伙，快步而行，向停在路口的小轿车奔去。

这时，“砰砰砰”枪声四起，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受了伤不住地呻吟。

那个穿黑西装的家伙发觉大事不好，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向前跑，连身边的妻子也顾不得了。这时，一个黑影猛扑过去，大喝一声：“哪里逃！”

“砰！砰！砰！”三发子弹射出，那穿黑色西装的家伙当场命归西天。

整个战斗只用了十几分钟。随着一声“撤！”的命令，伏击者趁夜色遁去。

第三天，上海中外报纸纷纷报道说，这次事件共打死四人，打伤三人，并说这是“东方第一谋杀案”！

那么，那穿黑西装的是谁？追捕他的人又是谁？为什么要杀死他呢？“东方第一谋杀案”的真相是什么？

那个被打死的穿西装的人，名叫白鑫。他原来是中央军

委秘书。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他秘密通知彭湃、杨殷等同志，二十四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也参加。

二十四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同志因有事，临时请假未能到会。

会议进行中，国民党特务便偷偷包围了会场。接着，军警开卡车前来，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伍豪！谁是伍豪？”（周恩来的化名）特务们咆哮着。

彭湃同志等站在一旁，怒目而视。

“彭湃？谁是彭湃？”特务们冲过去，一把拉过彭湃同志，用手铐扣住了双手。

奇怪，特务们为什么会拿着名单？又为什么那么准确地认出了彭湃同志？这里肯定有问题。

“谁是杨殷？杨殷，你他妈过来！”……

就这样，在场的，除了白鑫夫妇，五位同志都被铐上手铐，推推搡搡，装进了囚车。

事情发生后，陈赓同志立即判断出，肯定出了叛徒。这叛徒不是别人，就是白鑫！他派人去盯住白鑫，但是白鑫夫妇已被国民党特务带走了。

白鑫确实是叛徒。在此之前，他已经秘密向敌人自首，而且交代出，他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彭湃等共产党要人。敌人十分高兴，他们与白鑫暗中定计，借我们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妄图来个一网打尽。幸尔周恩来同志因有事未能到会。特务们带走彭湃等五位同志，留下白鑫夫妇，显然露

了马脚，所以，他们又派人把这两个叛徒带走，表面上抓了起来，实际上暗中转移，加以保护。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同志指示陈赓，一方面设法通过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党员同志，打听到彭湃等同志的关押地点、审讯情况，以便营救；另一方面一定要找到白鑫夫妇，伺机除掉，以绝后患。

彭湃等同志在狱中表现十分顽强。由于他们是被叛徒出卖的，一切事先编好的假口供统统无用。敌人对他们严刑拷打，五个人坚贞不屈，只字不吐。

陈赓同志通过我们打入敌人特务内部的杨登瀛同志，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被关押的地点。

经过周密计划，周恩来同志决定劫法场。怎样才能把这一消息传达给彭湃同志，并且得到他们的配合呢？

在敌人进行秘密审讯的那天深夜，杨登瀛领着我们的二位同志，进了审讯室。开审后，杨登瀛站起来，对彭湃同志“痛骂”一顿。与此同时，那位同志站在杨登瀛身后，巧传信息，使彭湃同志明白了党中央的意图。

蒋介石很快下令，枪杀彭湃等同志。

八月二十八日清晨，黄浦江上弥漫着沉沉浓雾。法国梧桐滴着泪水一般的雾珠。

从外白渡桥到龙华，一路上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装载彭湃等同志的囚车，被夹在十余辆全副武装军警的卡车中间。市民们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们知道，又要有革命者倒在龙华杀人场上！

陈赓等同志指挥的红队队员，已经按事先计划好的地段埋伏起来。为了拦劫囚车，还专门备好一辆大卡车，里面装

满了大米。卡车后面，几十人装扮成出外景的电影工作者。只要暗号一响，他们就投入战斗。

他们手中暂时还没有枪支。怕路上有特务搜查，专门有一辆车装枪支，按约定时间开到指定地点。

囚车已经驶过来。

然而，敌人事实上也做好了应急准备。这天，出动的军警格外多，实行了沿途戒严。相比之下，敌我悬殊甚大。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只好忍痛放弃原订的计划。

彭湃同志等英勇就义，许多同志失声痛哭。

周恩来同志痛定思痛，在党内刊物上撰文纪念，并且派人将流落在香港的彭湃同志的母亲彭老太太接到上海，进行妥善安置。与此同时，指示严密监视白鑫行踪，定杀不赦！

叛徒白鑫在彭湃等同志被捕后，不是被带走了吗？过了几天，国民党报纸装模作样发表了一条消息，说白鑫“年幼无知，误入共产歧途”，“蒋主席爱护青年，下令释放，既往不咎，并于前日去往南京”。实际上，白鑫夫妇被从家里带走，只是想造成一种他们被捕的假相，以麻痹共产党人。他们已经被国民党特务保护起来。

怎样才能侦察到叛徒的行踪呢？白鑫是不是真的到了南京？陈赓同志要杨登瀛同志加紧活动。

大约九月中旬，白鑫带着保镖突然到达生医院找柯大夫看病。柯大夫喜出望外，加意地为他诊病，然后对他说：“你坐一坐，有几种好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去给陈赓同志打电话。不料叛徒多疑，等他回来时，已经悄然离去了。

陈赓同志指示说：“没关系，他信任你，以后还要找你看病，设法稳住他！”

这位柯大夫是何许人也？他既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又是我党秘密工作人员。那时，他化名柯达文（原名柯麟），和贺诚同志（化名贺雨生）一起，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弄堂里开了一所达生医院，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党中央会议室。党中央每月在这里开一次会，有时周恩来同志也在这里接见外地来汇报的人。

白鑫不晓得这些情况，只知道柯大夫医术好，又是广东人，一副书呆子相貌，大约不是共产党。

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请柯大夫到法租界一家饭店看病。柯大夫向陈赓同志汇报后，按约定时间前往。

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国民党特务范正波。

一见面，白鑫用怀疑的口气问：“那天，你说下楼取药，怎么出去了？”

“哦。是这样，”柯大夫镇定地回答，“我到楼下一找，缺一种药，我想出门一拐就是药房，心想快去快回，谁知我赶回来，你怎么走了？连药也没拿！”

“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时间快到了，等不及拿药，只好走了。”白鑫编了一通假话。

柯大夫给他看病，打针，留下药，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对柯大夫不大放心，想多留一会儿让范正波观察一番。

“你那医院太小了，”白鑫拉拢说，“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

柯大夫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

“我帮你！”白鑫拍拍胸脯，立即从皮箱里掏出五百元钱，递了过去，“柯大夫，不敢言赠，表示一点小支持！”

“哎呀，这——”

“收下，柯大夫，我一定帮你建个好医院，你放心！”
白鑫把钱塞在柯大夫手里。

“收下吧。”范正波也说，“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大夫出了饭店，坐电车兜了几个圈子，看看身后没有特务盯梢，便赶到陈赓同志那里汇报，把五百元钱也如数交给了党。

陈赓同志十分兴奋，说：“好！继续侦察，一定盯紧他！”

又过了几天，白鑫派车接柯大夫去看病。

小车停在了霞飞路（淮海路）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门口，按了电铃，出来开门的不是女仆，而是一个一身黑衣黑裤短打扮的男人。

柯大夫看了病，但一时弄不清楚这四十三号是不是白鑫的住宅？如果是，为什么范正波兄弟又指指挥挥，若在自家呢？

他如实做了汇报。

柯大夫限于身份，只能做外围工作，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要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陈赓同志把任务交给了杨登瀛同志。

前面说过，杨登瀛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但他打入国

民党特务内部后，倍受青睐，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党为了他便于开展工作，特地给他买了小汽车。这样，他经常出入国民党上层和特务之中，范正波一直把他当作最可信赖的人。杨登瀛利用这个关系，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在最紧急的关头，救过我党许多同志。

这次，陈赓同志找他，叫他弄清楚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他便说：“那是范正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唔！原来如此！”陈赓同志若有所思。

“你放心，我马上去，把白鑫定在这里，不许转移，以便咱们下手。”他说。

杨登瀛登门拜访，范正波受宠若惊。他们正在客厅闲谈，白鑫下楼到院内散步，杨登瀛假装不知，问那是谁，范正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了他。

一个正要找这无耻的叛徒，一个正要多巴结几个国民党上层人士，他们相见之下，都有几分“恨晚”的样子。

“杨特派员，乞望今后多多指教！”白鑫一副奴才相。

假特务真共党的杨登瀛，看着面前这个叛徒，恨不得马上掏出手枪结果了他。但是，理智告诉他，不能鲁莽从事。

他强压怒火，笑笑问：“听说彭湃等人是你告的密？”

“是是，”叛徒搓搓手，“只可惜那次周恩来未能到会，否则他也跑不了。”

“你对党国有功呵！”

“不敢！”

“我一定向中央报告，”他话里有话地说，“对你要论

‘功’行‘赏’的。”

“这……”叛徒一副媚态，“多谢杨特派员！”

“应当，应当！”他吐了一个烟圈，“我一定向中央报告！”

这以后，他几次到范家找叛徒谈话。他对白鑫说，彭湃被杀一事，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住在范公馆里，否则会遭致祸端。

白鑫听了，立即出了一头冷汗，请求说：“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要我到南京去吧。”

“现在不能走！”他说，“得过一阵，风声小了再动不迟。”

“是是，可是我这心里……”

“不要怕！”他一语双关地说，“有我在，这件事最为保险，你放心好了！”

有一次，他在时，正巧柯大夫前来诊病。杨登瀛冷眼相看，假装不认识。等柯大夫走后，他用关切的口气问：“这个人可靠吗？不要把共产党引进来。”

“不是不是。”白鑫肯定地说，“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那就好！”杨登瀛笑着说，“这地方可千万不能叫共产党侦察到。”然后又回头告诉范正波：“正波，不可大意！”

“放心好了，登瀛兄，能进我这门的，都是最可靠的人，共产党绝对找不到这里！”

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杨登瀛时常前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上是为了把叛徒稳住。

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又有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保护”，白鑫还是心惊肉跳，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彭湃、杨殷等人混身是血地站在他床头。柯大夫给他吃药、打针，也无济于事。

他一再请求范正波，要范向南京方面报告，他希望出国去躲风，比如去意大利。在国内，即使是去南京，到广州，他也认为不安全，总有一天共产党会找到他，替烈士报仇。

国民党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

陈庚同志听到汇报后，立即向周恩来同志报告。周恩来同志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组织精悍的红队队员，坚决除掉叛徒！

这时，柯大夫看病更加仔细。建议白鑫去风景宜人、环境安静处疗养。白鑫更加坚定了出走的决心。

杨登瀛这位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得知白鑫意欲去意大利当“寓公”，显得格外的关心。什么时候走合适，坐什么轮船，连是深夜出大门、还是白天出大门好，都一一提出意见。这使得叛徒感激涕零。

叛徒哪里晓得，一张置他于死地的网，正暗暗向他头上罩来！

白鑫和范正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十一时，并且船票已经定好。到时，小汽车停在和合坊弄堂口。白鑫夫妇则从范家公馆后门出来去上车。

本来，按范正波和他弟弟（也是国民党特务）的意见，小汽车停在公馆前门口，出门就上车。